

明代泉州商人的财富路径

王丽明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明代是泉州商业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朝廷严厉的海禁政策, 并没有挡住泉州人的从商步伐, 反而促成了泉州商贸由官方贸易向私人贸易的转变。民间商人的活动也恰恰就在这个时期空前活跃起来, 开创了由明而后蓬勃发展的海上私商, 并最终完成由官方贸易到私人海外贸易的转型。然而这种转型是被动和局限的。泉州的各种典籍志书中记载的明代商人故事, 帮助我们去了解那个时代的泉州商人与商业活动。本文通过详细分析这些或详或简的商人财富故事, 剖析明代泉州商人的财富路径, 从经商缘由至最后的财产流向, 分析商人深层次的价值理念, 并与同时期的欧洲商人进行简略的比较。

关键词: 明代; 泉州商人; 财富追求; 财富积累; 价值观念

中图分类号: F129.5(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24(2015)03-0001-06

收稿日期: 2015-03-20

作者简介: 王丽明(1972—), 女, 福建泉州人,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泉州经济史及海外交通史研究。

DOI: 10.16125/j.cnki.1009-8224.2015.03.001

明代以前, 泉州历任统治者励精图治, 推动着海外贸易走向巅峰, 但明朝廷实行的严厉海禁政策极大地压制了贸易的发展, 泉州港至此走向衰弱。和官方港口衰退不同的是, 明代私商队伍逐步壮大并持续发展, 开启了民间商业的序幕, 推动华侨群体的形成和偏远走私港口的繁荣。以明代为核心的前后三百年, 成为泉州民间商人空前活跃的时期。此时的泉州, 如同欧洲国家一样, 经历着商人财富不断积累, 社会商业化氛围不断浓厚, 重商思想不断加深, 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的过程。笔者曾经认为, 官方压制下私商的发展, 正是泉州已形成不可遏制的贸易习俗的明证, 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内生动力(贸易热情)推动着民间商业的顽强生存与发展, 但在仔细研读明代泉州商人经商致富的故事后, 更多地却看到了泉州商人的被动和局限。这种局限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明代泉州的商人财富无法像欧洲的商人财富那样逐步转向资本的原始积累。

一、从几则明代泉州商人的经商故事看其财富追求的缘起

事实上, 泉州是一个离不开海洋, 离不开商业的城市, 农本社会中恶劣的地理环境, 逼迫泉州人去寻找生存的途径。商品交换是选择的结果, 是生存的需求, 因此商业于泉州自古就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几千年来, 商人经商逐末为文人志士所不屑, 商人始终不是封建王朝记载的主要对象, 被留传下来的经商故事少之又少。但因泉州商人之多, 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之重要, 使泉州的各种典籍志书中仍有不少商人经商致富的故事。选取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几则, 有助于探讨明代泉州商人的财富路径乃至理解明代泉州商人的价值观。

《泉郡萧衙萧氏本房谱系》中详细记载了五世叔祖新泉公的经商故事。新泉公, 讳大举, 字文博。

“公年十七岁, 而朴斋公见背矣。家贫无以为生, 赖陈氏强自支持, 荼苦拮据。新泉公以少孤辍业事商, 辛勤百状, 不能悉述。娶范氏, 生松、柏、槐、桂兄弟四人。致薄屋四座, 薄田四百余亩。居常不为豪举, 不事雕饰, 俭以自奉, 隆以祭祀, 厚以待宾。尝呼松、柏兄弟廷示之曰: ‘尔祖父辛勤治一经, 仅以贡途任浙水海盐令, 余愧不能文, 竟以家窳就商。尔松、柏忝为仕者, 当宏尔祖尔宗, 无负爱山公芳躅也。我生平不由祖业, 强自立。两经回禄, 旋即复振, 竟免于饥寒。又愧无以厚业, 为尔辈贻。尔当择贤师, 以朝夕从事, 亲俊士, 共聚首奋励, 毋得因循苟且过日。且难得者时也, 难成者功也, 易迈者年也, 尔其念之。’松、柏佩此训, 未尝顷刻安。

二十岁俱为邑弟子员,而槐、桂尚总角而未弁也。于松逾不惑,而柏亦近,虽屡为县尹、郡守、宪台所拭目,乃未能脱颖以愆父志,而父已即世矣。……”^[1]

文中详细描述了新泉公辍业事商以致富,致富后谆谆教导后世子孙时袒露的心路历程。

重商主义儒家李光缙在他的《景壁集》里绘声绘色地记叙了李寓西由下贾至中贾再到上贾,最后息肩于农的过程。

“余家世治书,不喜贾,有之但坐窥市井耳,不喜行贾。兄伯自其王父由吾儒林徙安平,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兄伯年十二,遂从人入粤。甚少有诚壹辐辏之术,粤人贾者附之纤赢薄货,用是致贾,时为下贾。已徙南澳与夷人市,能夷言,收息倍于他氏,以故益饶为中贾。吕宋澳开,募中国人市,鲜应者,兄伯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其后安平效之为上贾。太史公称卓氏、宛孔、程郑之属,……通商贾之货,然未有浮海道市东南夷者,安在其可凡兄伯也。或曰:若是则安平之市无凡夫矣。

……

兄伯为人伉而爽,重信义,不侵然诺,好扶人之急,恤人之穷,居家以孝悌为先,其曾王父与余曾王父共穴而葬,兄伯出囊中金,修莹设蒸,倡诸族人,人以此重。兄伯气岳岳不肯人下,身侈于用度,所致万余金,多费之,不封殖其家货,至今不甚起。子长者修息,少者治书,令无失吾儒林之风云。或闻而谢曰:吾乃今知若兄伯矣。贾先敏也,知福智也,蚤息断也,晓译奇也,不贪县官利义也,重祖重宗孝也,货殖可传,进于贾矣。

……

余曰:唯唯否否,……用贫求富,农不如贾,积德累行,贾不如农,故兄伯晚年税驾于贾,而息肩于农,筑庐田间,锄云耕月,笠雨蓑风,酿禾而醉,饭稻而饱,徐徐陶陶,春秋不知,荣枯不问,而兄伯老矣。夫是道也,息可休宁,静可止遽,此兄伯所为寿也。”^[2]¹⁰

晋江金井石圳村,濒临大海,是著名的侨乡。石圳村现存一部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修、雍正十年(1732)重修的《石圳李氏族谱》,记载家世甚详,谱中有传记百余篇,其中涉及外出经商的传记也有不少,撷取其中“璋廿六公绍英传”。绍英字敦厚,号心台,生于万历廿六年(1598),卒于顺治十三年(1656)。

“因祖父以来,家事清淡,田园希微,奋志刻苦,磨铁成针。念兴家之无策,揭本营生。幸知己之有人,总角之年,方知世事,二八之天,始悟艰难。远离双亲,漂流江湖。江南之大地,苏杭之名邦,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襟三江而带五湖,金陵古帝王所必争之地,财帛之所产,货物之所聚,四方之人皆得远游而生涯焉,而我心台公遂复揭借微本,以为远游之计。幸有知己,同心合本,用银买货,直抵苏杭诸州……去发其货,而收子母之利;来取其物,而得所产之贵。及余资既裕,财本充足,始复回家创置乾坤,别求婚配……又于是择地向吉,起盖房屋一座,开设学校以教族中弟侄。”^[3]璋廿六公绍英传

文中记叙了李绍英因贫入贾,揭本营生以致富,后回家置学教授弟侄的故事。

清光绪手抄本《钱屿洪氏图谱》中介绍了洪贺的故事:

“洪贺,字世旺,号松峰,晋江人。性质实,能治生,平日崇信义,重然诺。凡商货远至,必藉司平。与人贸易,无不倚重敬信者。自奉俭约,服取蔽体,食取充饥,居室取完固。用能铢积寸累,有中人之产。初与二兄同事父母,稍饶,乃请独任养,先志承欢,甘糲毕致。乃丧葬,百凡独肩,不累二兄。自壮至老,徒步道中,未尝乘车马。少知学,作字端楷,虽冗忙中无一画潦草。用以课子有成立。及子贵受封,淡约不改。或劝其曰:“公今富贵且老矣,不可以徒行。”贺曰:“吾敢以富贵加诸乡党族哉。”郡太守屠东崖谓其任真不饰,不以器用衣服饮食损德。终其身无不酬之德,无必报之怨。殿元茅见论谓其起家节俭,言语必信,利不为微取,名不为矫立。含贞履素,城府洞然。盖实录也。年八十四卒。子富,嘉靖己丑进士,历官参政,初封父刑部陕西司主事,晋封江西司员外郎,终封中大夫、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运使。”^[4]²⁴⁹

记述中刻划了一个虽贾致富,却始终恪守传统礼德敬奉父母、和睦乡邻、教子有成的形象。洪贺其子洪富,是嘉靖元年举人,八年进士,官至大中大夫四川参政。

以上撷取的记载虽是个例,却非常典型,仔细分析他们的财富故事可以看出明代泉州商人的一些共性。泉州背山面海,自古“虽欲就耕无地辟”,在农本社会中,无奈的泉州先祖很早就活下去的追求中学会了交换。唐宋元的发展,使泉州经济、社会、文化高度发达,吸引大量中原人内迁,他们带来的儒家文化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泉州人的思想。经商贸的原发性冲动与儒家修身养性、向学求仕的思想交织并存,塑造了明代泉州商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投身商业更多的是缘于生活所迫。正如前述几则故事所述,新泉公“家贫无以为生,赖陈氏强自支持,荼苦拮据”才“以少孤辍业事商”;^[1]李氏绍英“因祖父以来,家事清淡,田园希微”、“念兴家之无策,揭本营生”,^[3]象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泉州府志》里

崇尚的孝子丁怀可也是因“家贫业贾以养父”。^[5]卷52人物志·笃行 充分的事例告诉我们,经商是许多泉州商人生存下去的选择,他们投身商业或多或少有些许被动,是最原始的生存需求,使他们抛弃一切,包括理想、信念甚至生命,在政策壁垒中寻求缝隙。

二、明代泉州商人的财富路径

经商缘起的初始动机,影响了商人财富积累与去向的轨迹。有趣的是,明代泉州商人表现出来的财富路径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对这种相似的探讨,无疑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

从前述四个财富积累的典型例子可以看到,大部分由贫入商者,几乎是从小本经营开始,从小商小贩起步,逐渐地积累起财富的。从商之始,没有本金,或贷或借或合伙。李寓西行商之初“甚少有诚壹辐辏之术,粤人贾者附之纤赢薄货,用是致货,时为下贾。”^[2]¹⁰石圳李绍英也是“揭借微本,以为远游之计。幸有知己,同心合本,用银买货,直抵苏杭诸州……去发其货,而收子母之利;来取其物,而得所产之贵。”^[3]《泉州府志》记载晋江人诸葛希孟“少食贫,与兄贷富人金,浮海为生。卒大困,富人操子母来算,先世遗产殆尽。”^[5]卷60明笃行 这些商人从小资本开始,都要经过艰难的奋斗,勤勉俭约。萧新泉“辛勤百状,不能悉述”^[1]李绍英“远离双亲,漂流江湖。”^[3]璋廿六公绍英传洪赞“自奉俭约,服取蔽体,食取充饥,居室取完固。用能铢积寸累,有中人之产。”^[4]石圳李氏又有另一段“璋五十九公敦郁传”记:“贤于生理,通商买卖,习于会计,出入钱银,勤俭致富,营立江山。性情宽容,四方之赤子皆在度内,志气广交,远乡之宾客咸称雅量……远通外国,信义之交恒敷于人心,和睦乡闾,老幼每称其志节。首出生理,全获其利。及回本乡,大兴土木,起盖房屋,广置田宅,以遗后来,开筑坟墓,尊祖敬宗。”^[3]璋五十九公敦郁传 从族谱看,李敦郁也是一个靠走外洋勤俭致富的海商。当然也有少数商人是通过特权和垄断牟取暴利,从而迅速致富,但占绝大多数的仍是一步一个脚印,通过艰苦奋斗勤奋俭朴而发迹的。

从这些商人发家致富的路径分析中,不难发现,他们由小商业的累积而逐渐扩大为大商业,有了促使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现象产生,这一点不容忽视;也有了富家出财,贫者出力,初步具备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雇主与被雇佣者的关系,甚而发展到自由商人阶段。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使封建生产关系萌发出新生产关系出现了可能。晋江“黄廷榜,机织为业,所嗣所生并隆,孝养一门三十口,合居共爨无间言”,^[6]卷52,人物志·孝友 晋江石崖《许氏族谱》称:“享氏,丁亥戌子(1647—1648)沧桑,与其兄各窜外所,平后独归,晖潜公喜不自胜,畜于家,送至机房,学治丝之事。……为昌,……承叔父启务开鬻绸缎,市情热闹,甲于同行。……亮昌,……家境乏后,兄弟协力经营,专理丝房。……万昌,……自幼从兄协理丝务,后开铺营生”。^[7]许氏家族自设丝房和染房,自设商行外销,其行销的地点,南至江宁、江浙、漳厦,北至包头、燕、齐、鲁、卫。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业财富的发展正在具有解放封建生产力的进步作用,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方向。如果这些商人财富能作为原始积累而被利用,如果这些财富当时能够投资到手工业生产中去,资本主义萌芽将会有长足的进展。遗憾的是,历史的发展并非如此。明代商人财富同封建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人资本来源,大部分出于高利贷,“齐贷子母钱往市者,握筹而谋,可坐致富。”^[8]而所获的资财,又大量地重新流入封建经济的动脉中,不能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对封建经济不是瓦解而是起着维护作用。

许多从事商业活动而发财致富的人,在社会现实环境的影响和家族观念的感召下,回馈社会,慷慨捐献钱财,举办家族的各项事业。这一方面正是泉州商人乐善好施传承传统儒家理念的体现,同时又是投资增殖的商业行为的缺失。《闻见偶录》中曾记载的蔡廷魁就是较典型的,致富后把相当多的资产都捐给家族事业的人。一般发财者捐的比例没有这么大,但从泉州民间族谱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致富后捐资创办家族事业的人比比皆是。《泉州府志》亦有不少记录,不妨摘录几则:“曾邦庆,字维章,晋江人,生而根器淳厚,事父母尽欢。丁播迁之变,父母相继沦丧。弃举业出走四方,归家颇饶裕。即议建祖祠,为族人倡修葺远代祖塋”。“吴锡珪,字文真,南安人,性淳厚笃于本。滨海播迁后连丁两丧,寄迹于外,独力经营得饶裕,遂移兄弟团聚,而宗祠祀田祖塋亦以次修建。”“叶方荣、方菁,安溪人,同胞兄弟,俱为诸生,好施予,曾捐银七百两倡修祠宇,仍备春秋祭费”。^[5]卷61,乐善 正因为如此,“族必有祠”在明清时期的泉州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即使海外经商者,最后也不忘回归家乡置业。《岱峰英岱三瑞堂洪氏族谱》记,晋

江十四都蔡垵村(今金井钞岱村)洪邦丽,“公以家淡薄经商,适奎峰黄先生开澳与夷贸易,公即抵广为之。自后二弟为巨商,白手起家,公始之也。”其弟洪邦质,“公孝友诚恻而有度,故江外之人重之,裔夷亦贾以数万金,终以成业归家,买田宅,构大厦……”他们因与乡族组织的密切结合,而有着自觉的乡族责任感,自觉肩负着振兴乡族,和谐乡族的任务,商业利润很多用于满足家族的各种礼仪活动,继而建祠立祀,整器修谱等,财富更多地体现为消费性的投资,逐渐丧失了积累。这成了明代商人最普遍存在的财富流向。

三、明代泉州商人的价值取向

财富路径的走向正是商人价值取向的直接体现,明代泉州商人在追求财富的同时,其价值观始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熏陶。不论他对财富和商业有着怎样的渴望和追寻,其最后仍是与封建王朝站在同一立场,或回归农本,或追求功名,或慕儒尚学,从而失去了财富投入生产再扩大再积累以形成强大生产力,催生新的生产关系的机会。这点也使之与同时期的欧洲商人有极大的不同。

明代泉州商人的构成及其阶级出身,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被传统封建关系排斥在外的地方贫民,这一部分占绝大多数。他们迫于衣食之忧而逐末,“盖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鼓柁相续,谓生涯无逾此者。”^[9]但正如前文所述,促发他们虽“时有飓风之险,亦冒为之”的原因,更多在于养亲养家。第二类是以儒治贾者,也占有相当的数量。“黄继宗,晋江人。幼慧习,举业既长父歿家贫,稍治生以奉母有余,则以助族戚之贫困者。”^[5]卷59·第行“张志立父文郁,生五子,志立居长,弟四人俱歿。家徒四壁,乃舍儒就贾,拮据奉父。诸孱呱呱在疚,卵翼抚育,一如己子。所在解纷济急,勇往直前。后以孙维枢贵,赠工部左侍郎。”^[6]卷52·人物志·第行“杨宗叙,晋江人。幼警敏。以贫辍儒业,为贾迁计,资稍集。”^[5]卷59·第行“杨乔,安平人。十岁通经史大义。会父及伯兄继歿,仲兄遭宿疾,不任治生,乃辍儒之贾。”^①这些弃儒从贾者,或是因贫辍儒,或是失职衣冠士,或是不得志儒生,总之几乎是“学不遂”“仕不成”才“行贾四方”的,多少也有些无奈。当然,泉州商人的构成中还有一类数量很少的势家望族。闽县知县仇俊卿曾描述沿海大姓的走私行动:“漳、泉多倚著姓宦族主之。方其番舡之泊近郊也,张挂旗号,人亦不可谁何。……甚至有借其关文,明贴封条,役官夫以送出境……”^[10]281说明当时有地方官吏参与走私活动。族大之家,如梅岭的林、田、傅三巨姓,安平的陈、柯、黄、杨诸姓,都以经商行贾著称。这些人一面违禁通海,擅放巨舰,勾引接济,一面私充牙行,居积番货,包庇走私。他们的商业活动虽是主动之为,但前提是不能触及已有的权势和地位,所以始终以封建王朝为保护伞,不可能站在其对立面。因此,明代泉州商人整体与统治阶级联系紧密,具有较浓的封建性,这也决定了他们的价值理念始终脱离不了束缚,即使有着与欧洲商人一样的冒险远征行为,有着经商牟利的冲动,但对财富不顾一切的追求与激情远不如同时期的欧洲商人。

贫而入商者,如上所列举的兄伯李寓西,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贾,积德累行,贾不如农”,在李寓西看来事贾是为了脱贫,无德行可言,于是致富后他将悠然田间,回归农本作为积德之行。“故兄伯晚年税驾于贾,而息肩于农,筑庐田间,锄云耕月,笠雨蓑风,酿禾而醉,饭稻而饱,徐徐陶陶,春秋不知,荣枯不问,而兄伯老矣。”兄伯因晚年息肩于农,躲过了吕宋一劫。李光缙将此归之兄伯超出常人的预见之能,“其初兄伯之吕宋,皆身自往。自榷使出,海上之税归之中官,兄伯策其必败,遂不复往。不数年,好事者言夷地多金,遣使侦之,夷人疑有它谋,遂屠戮中国贾人以数十万。令兄伯俱去,能独免乎?愚者暗已然,智者识将然。斗智争时先一市人,此吾所以不凡吾兄伯也。”其实“吾之兄伯”之所以不再往吕宋,并非预见到危险,而是其时泉州商人的“知足常乐”,以农为本的经济追求的体现。^[2]10

弃儒入商者更是始终向往在现行封建政权中求取功名。他们慕儒求仕,十分强烈的政治依附性成为最明显的弱点。在泉州商人的传记中“弃儒从商”“舍儒就贾”的类似字眼比比皆是,这固然反映了不少商人早期接受儒家基础教育的事实,但也不排除粉饰包装的成分,以及从事商业的无奈,“儒”已经成

① 各地的志书或繁或简地记载了一些商人从商的故事,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本文主要参考的地方志书有《泉州府志》《晋江县志》《海澄县志》。

为商人的一种精神资源。弃儒就贾者成功后的自足,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自慰。李光缙撰李寓西家世时明确言“余家世治书,不喜贾”。他们总强调自己原本业儒,只因生活所迫不得已弃儒入贾,一直不能完成儒业视为人生憾事。新泉公在训示后辈时说“余愧不能文,竟以家窘就商”,其言语是何等的痛悔。他谆谆教导富裕后的后世子孙勤勉读书。“尔当择贤师,以朝夕从事,亲俊士,共聚首奋励,毋得因循苟且过日。”让其子尔松、柏忝“为仕者,当宏尔祖尔宗,无负爱山公芳躅也。”^[1]这反映了其时泉州商人一个普遍的倾向:致富之后的商人将希望寄托于子孙后代重返儒业。在科举取士的社会里,一个家族社会地位的高低,常以该家族科举及第和入仕的人数,以及入仕者官阶的大小为衡量标准。通过族众的入仕,家族组织也能加强与国家政权的联系,并能获取社会经济上的实利或特权。子弟进学求仕,跻身士绅阶层,意味着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得以上升,这也是改变自身社会状况、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重要途径。因此,明代许多泉州商人的后代子孙,并未子承父业,继续商业或生产的累积,而是尽量为官为仕,走向士绅阶层,靠笼封建政权。洪贺之“子富,嘉靖己丑进士,历官参政,初封父刑部陕西司主事,晋封江西司员外郎,终封中大夫、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运使。”^{[4]249}这就是泉州商人热衷于捐资助学、提携子弟的原因所在,因此,在现实作为中,他们不遗余力地捐资设学,振兴宗族教育事业。

甚至那些被当势政权所排斥的,以抢夺作为致富途径的“盗商”们,其内心也极为向往改变身份,希望能够为官为仕。在政府严格实行禁海禁商政策时,一部分商人采取激烈手段来寻求获取经济利益,亦商亦盗,武装贸易,成为寇盗。这些腰缠万贯的寇盗,并非甘心如此,始终希冀自己有朝一日能从现政权对立的寇盗变成政权中的人物。特别是随着经济力量、武装力量越来越强,讨价还价的筹码也就越积越多,这种复杂的心理也越来越强烈。所以明代海商集团的海上武装贸易最激烈,却又最热衷于被招安。最典型的莫非势力最大的郑氏集团。天启中,泉州巡海道蔡善继派人招安,郑芝龙即向来人表示:“海上弄兵,原非本意,因寄迹东洋,受困倭人,迫而威之。今既承道宪严命,岂敢固执以负德意。”入泉州,诣辕门,去衣帽自缚,泥首阶下。这样的言行不正是急欲投靠政权的表现?崇祯初,郑芝龙虽纵横东南沿海,却一直不追不杀不掠,其用意正是想以实际行动向官方示好,“郑芝龙两次大胜洪都司而不追,获卢游击而不杀,败俞都督师于海内,中左弃城逃窜,约束其众,不许登岸,不动草木”;还向被获的卢毓英“将衷曲一一吐告”,通过卢毓英向官方表示愿意再次接受招安的心意。求降成功后,郑芝龙“差芝燕芝凤带金银,带币帛,同毓英入泉州城,先见王猷,次见邓良知,代芝龙陈始末,愿拜门下,缴上厚礼,各大喜。……英一代芝龙禀上,愿充辕门犬马报效,所有福建以及浙粤海上诸盗,一力担当平靖,以赎其罪,并呈重礼,文灿大喜,收之。”卢毓英也受托为郑芝龙要官请爵,“招安芝龙,固是不难,但芝龙以前抚未加官爵,恐遭势宦凌辱,是以逸去。今欲再去招安,若无官爵,恐不能服芝龙之心。”^{[11]6、10-11}可见其要的不是容其纵海从商的良好条件,而是在朝廷中谋求官职。这是当时商盗并兼的许多海盗的普遍心理,他们的内心深处迫切希望得到朝廷认可。这样的盗商集团所积累的财富是不可能为推翻政权积蓄力量的,只能增加了苟安于现政权的筹码。

四、总结

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商人对财富有着极大的兴趣和追求,他们将财富更多地投向生产,尽其所能地,最大限度地以钱生钱,以实现财富的增殖,从而逐步形成强大的生产力。因此,其时的欧洲商人是以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出现在社会政治舞台上,形成一股与封建领主制度相抗衡的社会势力,并且最终推翻领主制度,摧毁封建王朝,迈入资本主义时代。反观明代泉州,本应更具开拓精神和先进理念的商人集团,恰恰与此相反,他们并非对立于现有政治制度,而是对政治有着与生俱来的向往。

从秦汉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倡导以农为本的立国理念,在“士农工商”中,商人处于被歧视和压抑的状态,虽坐拥财富,然往往被视作为富不仁的卑下人物,社会地位比较低。明代的泉州商人同样也浸染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知足常乐”与不愿舍本逐末的传统伦理严重地束缚了他们,即便致富巨万,也仍对自己的身份耿耿于怀,因而对投资农工商等产业以实现财富的增殖,没有充分的追求。他们体现出与同时期欧洲商人截然不同的经济伦理,更愿意将人生理想与财富追求作适度分离,也必将这种理念淳

谆嘱咐子孙后代,希望子孙后代端正追求,走与政权息息相关之路。这样的商人,缺乏斗志,严重依附于政治,不可能具备加强团结,与旧体制抗争,从而争取本阶层应有的社会与政治地位。他们更多地希望着某种改变,生意越是成功,越是企盼当权者的青睐,希望能够身兼富商与官绅,跻身于代表着社会政治地位的士绅阶层,大概便是最为理想的人生追求。其结果必然也是随着王朝政治的兴衰而兴衰。因此,尽管明代泉州出现许多名噪一时的著名商人以及商人集团,并且催生了蓬勃发展的民间商业,但只能是现行体制下的流星,拥有短暂的光芒,却无法像欧洲中世纪末期的商人阶层那样,组合起自己的政治力量,团结各种势力,从而瓦解旧的体制,建立起崭新的历史时代。

参考文献:

- [1] 泉郡萧衙萧氏本房谱系[Z].“附新泉公行述合志铭”.海交馆收藏有该谱复印件.
- [2] (明)李光缙.景壁集[M].上册.“寓西兄伯寿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 [3] 石圳李氏族谱[Z].海交馆收藏有该谱复印件.
- [4] 陈聪艺.林铅海选编.粘良图审校.晋江族谱类钞[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 [5] (乾隆)泉州府志[M].
- [6] (道光版)晋江县志[M].
- [7] 石崖许氏族谱[Z].该谱现藏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资料室.
- [8] 洪朝选.洪芳洲先生文集.摘稿.卷4.瓶台谭侯平寇碑[M].香港:华星出版社.2002.
- [9] 陈瑛.海澄县志[M].卷15.“风土志”·风俗考.北京:北京书局文献出版社.1992.
- [10] (明)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1] (清)江日昇.台湾外纪[M].台湾:世界书局.1959年影印本.

(责任编辑 如意阳)

Wealth Pathes of Quanzhou Merchants in Ming Dynasty

WANG Li-ming

(Museum of Overseas Transportation History in Quanzhou, Quanzhou 362000,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stage of Quanzhou bussiness develop in Ming dynasty, the bon on maritime trade didn't stop the steps of Quanzhou bussinessmen, but helped to change government trade into non-government trade, which started a booming stage of non-government maritime trade since the late Ming dynasty. Many of the recorded stories of the bussinessmen help to know Quanzhou bussines activities at the time. The article analysized in detailed these bussinessmen's wealth stories, their wealth pathes, their property flow direction, their value ideas; then made some brief comparisons with European bussinessmen at the same period.

Key words: Ming Dynasty; Quanzhou merchants; wealth seeking; wealth accumulation; value ideas